

● 教育学

论梁启超“趣味教育”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意义

黄沁茗¹, 涂文迁²

(1.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武汉大学 文科学报编辑部,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黄沁茗(1969-), 女, 湖北罗田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讲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美育研究; 涂文迁(1969-),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 主要从事教育学与编辑学研究。

[摘要]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 以趣味即美感为逻辑起点, 论述了美育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尤其强调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特征, 旨在构建真善美相统一的“趣味生活”和理想的人生境界。这一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 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 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 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 他所倡导的“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 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

[关键词] 梁启超; 趣味; 趣味教育; 美育

[中图分类号] K825.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4-0503-06

“五四”前后的中国, 是一个需要思想巨人并产生了思想巨人的时代, 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影响, 时至今日仍不见消弭。梁启超恰恰生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并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之一, 他的美育思想对于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五四”运动为界, 梁启超的美育思想分为前后两个相对不同的时期。前期, 他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 强调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 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这时的美育思想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 基本上还是以儒家功利主义美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余续。后期, 随着改良运动的失败, 他退出政治舞台, 潜心学术, 注重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特征, 提倡“趣味教育”、“情感教育”, 这时的美育思想具有明显的超功利性质, 并实际地成为以超功利主义为主流的中国近代美学的重要发端之一。本文主要论述其后期美育思想。

一、“趣味教育”思想内涵

“趣味教育”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 也比较庞杂, 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意思。

首先, “趣味教育”的逻辑起点和内在本质。梁启超曾明确地宣称, “假如有人问我, 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 我便答道,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道, 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 我便答道, 拿趣味做根柢。”^[1] (第 12 页) 可见, “趣味”、“趣味主义”不仅是梁启超的审美理想, 也是他的人生信条, 由重“趣味”, 重“趣味主义”到重“趣味教育”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

梁启超说: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不是他创造的, 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 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 他则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梁启超这一改动, 就将趣味提升到了审美的高度, 意义十分重大。

“拿趣味当手段”，是“有所为而为”，总要以另一件事为目的，其结果是目的达到，手段抛弃，“趣味”也就没有了。而“拿趣味当目的”，却是“无所为而为”，“为了趣味而趣味”，像小孩子游戏一样，没有其它目的，这里“趣味”已成为一种超功利目的情趣、乐趣，也就是美感愉快。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他进一步指出，“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1]（第 13 页）。可见，梁启超所倡导的“趣味教育”中的“趣味”，不是一种形而下的感官愉快，而是一种超官能欲望的精神愉悦。在《学问之趣味》中，他更明确指出：“趣味”就是“快乐”、“乐观”、“有生气”，“趣味”的反面是“干瘪”、“萧索”，趣味具有健康向上的情感意味和生命意味。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趣味是一种超利害得失、超生理欲望的审美愉快即美感，这样，梁启超所谓的“趣味教育”在本质上就成为审美教育、美感教育。

其次，“趣味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基本形式。梁启超极力弘扬趣味、审美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为“趣味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梁启超说：“问人类生活于什么，我一点不迟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人若生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活也活不下去。”^[2]（第 22 页）他还说：“‘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重要者，倘若在生活中把‘美’的成份抽去，便活得不自然甚至活不成。”^[2]（第 22 页）总之，“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那么，如何保持生活中的趣味呢？梁启超认为，这需要通过“趣味教育”来解决。他说，“审美的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3]（第 24 页）。这就是说，人虽然具有审美的本能，但生活中的趣味和美感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进行有意识的培养训练，即通过一定的手段，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审美活动，不断提高感官的审美能力，把感官从麻木的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有趣。“尤其是人生在幼年青年时期，趣味是最浓的，整天价乱碰乱进，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总之，“趣味”之有无和“趣味”之高下都与“趣味教育”息息相关。

“趣味教育”之必要性在理论上已如此，那么在现实中如何成为可能呢？梁启超认为，现实的和理想的生活为趣味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善于感受、善于想象，随时随地都能受到美感教育。在梁启超看来，趣味的源泉有三。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水流花放，云卷月明，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即对自然采取一种审美态度，对自然景色、“影象”不断加以领略重温，便可以获得趣味。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人类心理有一种普遍可传达性，正如老子说的：“己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看出说出别人的快乐，可增加我的快乐；替别人看出说出痛苦，也减少我的痛苦，如果把人类心理这扇微妙之门打开了，那种愉快，真是得未曾有，所以俗语叫“开心”，即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一种审美态度，通过人与人的心理沟通、宣泄，可获得趣味。三、“他界之冥构与摹进”。梁启超说：“肉体上的生活，虽然被现实环境捆死了，精神上的生活，却常常对环境宣告独立。”^[4]（第 23 页）通过想象，创造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忽然间超越现实界，闯入理想界去，便是那人的自由天地”^[4]（第 23 页），即可获得无穷的趣味。总之，无论是外部自然、社会生活还是艺术的形式都是引发美感的重要“机缘”。“趣味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充分利用这些审美因素，有意识地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让人们拥有一双会看形式美的眼睛和会听音乐的耳朵，拥有一颗热情敏感的心灵。

第三，“趣味教育”的主要途径和基本特点。虽然，在梁启超看来，天下万物都有趣味，“人生生活于趣味”，只要有生活、有事做就有趣味，然而对于“趣味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即他所谓的“趣味的主体”，他还是有严格界定的。梁启超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叫‘趣味的主体’，而凡一种趣味事项，倘或是要瞒人的，或者拿别人的痛苦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间相续，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严格说来，他就根本不能做趣味的主体。”^[1]（第 14 页）经过比照，梁启超列出了四项趣味的主体：劳作、游戏、艺术、学问。在劳作、学问主要还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手段的条件下，趣味毕竟是有限度的，游戏中所产生的趣味又往往稍纵即逝；而艺术比之劳作、学问、游戏却具有更为普遍、持久的影响力。因而在这四项主体中，他最看重的又是艺术教育。而在艺术教育中，他尤其推

崇音乐、美术、文学。他说:“美术的功用”,“是把那渐渐坏掉了的爱美胃口,替他复原,令他常常吸受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康健。明白了这种道理,便知美术这样东西在人类文化系统上该占何等位置了”^[1](第24页)。关于诗、小说、甚至整个文学艺术的作用,在早年他片面夸大其社会政治教育功能,抑古崇今,重内容而轻形式,主张宣传教育而无视审美娱乐。在晚年,他有意识地纠正了“两界”革命时的偏颇,承认文艺独特的审美地位,不再片面地强调内容和精神,主张把内容与形式、精神与风格统一起来。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词》中,他强调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是“趣味”。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他一方面以表情的真伪优劣为批评的根本标准,强调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多次批评片面地重视内容而忽视形式的审美价值的倾向,他举李义山《碧城》第一首为例说:“这些诗他讲的是什么事,我理论不着。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这种文学是不容轻轻抹杀啊!”^[3](第53页)总之,在梁启超看来,文艺的本质就是趣味,就是审美。因而,艺术教育在整个美感教育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并成为“趣味教育”的主体。所以,他说,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

艺术教育何以有那么大的权威而成为“趣味教育”的主体?这是因为在梁启超看来,艺术教育主要是一种“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比之理性教育,在人的审美心理的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到的越发少”,而“用情感来激发人,好象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吸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时间占领了他心的位置”^[1](第71页)。这是梁启超对于艺术情感教育特征的极具本质性和独创性的阐发。第一,艺术的情感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它要经过“若干时间”才能占领读者、观众、听众的心。第二,艺术的情感教育是通过艺术家塑造的具体可感的形象,即物态化的情感来再现现实生活中“霎那时间便过去的情感”的。第三,艺术作品是艺术家融自己的审美心理、生活经验、思想情感于一体的自由的劳动创造的成果,艺术的情感教育具有鲜明“个性情感”的色彩,但是这审美个性必须与受众的审美要求和情趣息息相通,只有这样,才能“打进别人的情阈里头”,产生深远的影响。总之,艺术把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加以浓缩、物化,通过塑造的美的形象来感染人,触动人的情感,对人的心灵加以“薰”“浸”,如春风化雨,点滴滋润,天长日久,铭心刻骨,它对人的影响是深透、久远的。由此,梁启超称艺术是“情感教育的最大的利器”,说“音乐、文学、美术是情感教育的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并说“艺术家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掣,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它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1](第72页)。

最后,“趣味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梁启超看来,“趣味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既含真善又超越真善的理想的人生境界。梁启超说:“若就美术家自身说,他们的趣味生活,自然更与众不同了。”“假使‘人生生活于趣味’这句话不错,他们(指美术家)的生活真是理想的生活了”^[2](第24页),可见,梁启超所理想的生活就是如同美术家那样的“趣味生活”。“趣味生活”的实质是什么呢?在梁启超那里,“趣味生活”至少包含以下三层意思。首先,“趣味生活”是美与善的统一。梁启超说,“我平生最爱用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2](第28页)。他还说过类似的话:“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件事情做我的生活资料,我觉得很是合宜。”^[1](第60页)“责任心”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情感,“趣味”、“兴味”主要是一种个体性的审美情感,责任心制约着趣味,趣味又引导着责任心,既超越个人利害得失又不失快乐愉悦,显然是一种美善合一的理想境界。其次,“趣味生活”还是美与真的统一。梁启超特别推崇美术家的生活,他说,“他们的美感,比我们敏锐若干倍,我们领略不着的趣味,他们都能领略……”,而美术家所以能成功地创造趣味的生活,“全在观察自然之美。怎样才能看得出自然之美,最要紧的是观察自然之真。能观察自然之真,不惟美术出来,连科学也出来了”^[1](第6页)。他还说过,“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

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首先从求真入手”^[1](第 8 页)。总之,美术家的生活是美真合一的趣味的生活。最后,“趣味生活”本质上是精神与物质相调和而成的生活。梁启超说:“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人生观’”^[2](第 23 页)。梁启超“悬”的理想即是“趣味主义”的理想,只有这种理想才能将物质与精神即他所说的“物界”、“心界”调和结合而成一种生活。不难看出,他所说的生活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是物界被心界加以改造编织而成的,所以这种生活本身具有审美的性质,是既含真善又超越真善的理想的人生境界。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以趣味即美感为逻辑起点,论述了美育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强调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特征,旨在构建真善美相统一的“趣味生活”和理想的人生境界。他的这些观点独具创见,且深得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趣味教育”的历史文化价值

首先,“趣味教育”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美学观和文艺旧传统的进步意义,并直接成为当时思想解放、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对于开发民智、拯救世道人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晚年的梁启超,虽然退出了政坛,专事学术,但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与他的社会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产生了重大的现实意义。趣味是什么?梁启超说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要由每个人自己来领略,又说美感是“业种”,是活的,认为美感是一种不停息的创造活动,可见梁启超倡导的“趣味”、“美感”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创造性和自由性,这是对于“发于情,止乎礼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有力冲击,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的。同时,梁启超认为,人的“趣味”、“情感”还有善恶美丑的分别,而“趣味教育”、“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这种工夫做一分,便是人类一分的进步”^[3](第 71 页)。因此他大力倡导趣味教育,以此来改造国民性格,推动社会进步。他说,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做创造美术的“美术家”,但却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他有感于旧中国对审美教育的忽视,说:“中国向来非不讲美术——而且还有很好的美术,但据多数人见解,总以为美术是一种奢侈品,从不肯和布帛菽粟一样看待,认为生活必需品之一。我觉得中国人不能向上,大半由此。”^[4](第 22 页)他尤其尖锐批评当时的腐败政客,“职务废于丛脞、神志昏于酒饱”,“舍禽息兽欲外,复知有美感,不复知有学艺,不复知有人道,不复知有将来。滔滔者天下皆是,以雷霆之力销铄一世,夫岂无节士?入此游渊而陶卷去耳!”^[5](第 8 页)抨击时弊,大快人心!因而“那时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完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作用”^[6](第 199 页)。毛主席少年时读到《饮冰室文集》很受感动,周总理在日记上记下自己对梁启超的钦佩。鲁迅、郭沫若等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其次,“趣味教育”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视野,促进了近代美育的诞生。虽然,梁启超没有首先启用“美学”、“美育”的概念,但从美学思想的实际产生来看,他却早于王国维、蔡元培。“趣味教育”由“无所为而为”、不含有“计较利害观念”的“趣味”出发,强调审美的趣味性、愉悦性、超脱性,突破了儒家思想中美育与社会政治教育融为一体的“文以载道”劝善惩恶的旧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为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独立的审美教育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依据,梁启超也因此无可辩驳地与王国维、蔡元培一起成为中国近代美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第三,“趣味教育”既吸收了西方近代美学发展的新观点,又融合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儒、道、释三大美学思想传统,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方法,开创了一代新学风。梁启超自小受封建正统教育,戊戌变法失败后,曾避居日本,一战后,又遍游欧洲,其美学思想来源比较复杂。从总体上看,早期受儒道影响较深,晚期受佛家影响明显,西方美学思想则贯穿始终。一战后,他游历了欧洲,亲见了西方社会凋敝的景象,他对于西方近代工业、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思潮产生了失望和怀疑,因此他主张从东西比较研究的角

度出发,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在学理上进行独立自主的批判,既要“言之有理”,又要“摆脱依傍”,他的“趣味教育”思想主要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阐发的。因而他运用西方近代美学思潮主要是康德的超功利美学和柏格森的生命直觉美学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尚“趣”、重“味”的传统思想进行改造,将儒家的社会责任心、道家的个人“兴味”、佛家的“无我”境界融合为一体,既做到了古今中外的圆融会通,又做到了独立自主的开拓创新,从而使他的“趣味”成为人们在追求知情意即真善美三者的统一中流露出的一种人生智慧,这不仅开拓了一种美育的新理论,更重要的是开拓了一种美育研究的新方法。加之,他在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时候有着“迷人的叙述力,大气包举的融化力,很有根柢的旧学基础,于是他的文章便与一班仅仅以转述或稗贩外国学说以论中国事物的人大异”^[3](第62页),“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从而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和文风,“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粉碎”^[5](第54页)。

三、“趣味教育”的当代启示

在当今空前激烈的物化技术时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在人们物质生活得到越来越大程度的满足的同时,社会问题却日渐加深:人与自然严重对抗,人与人的关系日趋冷漠,个体的精神空虚、情感无以寄托……这一切到底原因何在?早在20世纪之初,梁启超在考察西方社会之后就明确指出:“这是现代文明的危机。”他说:当时的社会“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一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调和问题”,二是“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的问题”。近百年过去了,梁启超所提出的问题恰恰是中国现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年欧美生活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如何使“社会不变为机械的,使个性的‘仁’的社会能与时势并进而时时实现”^[6](第64页),梁启超认为,通过“趣味教育”“悬”一种“趣味主义”的人生理想,可以实现物质与精神即他说的“物界”与“心界”和“个性”与“社会性”相调和的生活。“趣味教育”本质上是审美教育,它引导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采取一种无功利目的、超个人利害得失的审美态度,对于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个人与自然以及个体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构建和谐的社会和完美的人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近百年过去了,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愈来愈显示其远见卓识和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如此,梁启超以自己的“趣味”人生躬行践履着它的“趣味教育”思想,为美育理论与美育实践的有机统一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和完美的典范,启迪人们不断去追寻和创建更加美好的社会生活。

首先,“趣味教育”引导人们对自然采取一种审美态度。梁启超借用《牡丹亭》里的一句话“我常一生儿爱好的是天然”来表明他对自然的热爱之情。他认为对自然之美的“赏会”与“复现”是人们获得趣味的源泉之一。在他看来,自然界的一草一木,所谓“水流花放”、“云卷月明”都是“美景良辰”、“赏心乐事”,无不充满了无穷的“趣味”,这是对自然的一种亲和的审美态度,它是人对自然的欣赏、珍爱、保护,而不是人对自然的单向的征服、掠夺、扼杀,这种审美态度有利于推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和谐。

其次,“趣味教育”引导人们对现实人生采取一种审美态度。在梁启超看来,“人生生活于趣味”。无论工作也好,学习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在他那里都有享用不尽的趣味,他说,“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我的趣味”^[2](第15页)。他非常讨厌中国人见面常说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好象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法过,勉强找些事来消遣他”,“我觉得天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2](第15页)。正因为对人生抱有这么浓厚的趣味,从未见他有消极、悲观绝望的时候。在政法遭到失败,被追捕亡命他乡的时候,仍然满怀希望地去“生活”,去工作,去奋斗。政治改良受挫折,行不通,就从事宣传,大造舆论,以备东山再起,东山再起仍然失败,证明“此路不通”,自认“无才补天”,便退出政治舞台而从事学术教育,同样干得津津有味,活力不减当年,从未想过要退居山林,吟风诵月,颐养天年!这种对待人生的积极乐观的态度,显然是一种审美态度,“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态度,以之指导人生,就能“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从而通向精神“自由的新天地”。

最后,“趣味教育”引导人们对社会采取一种审美态度。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既不是物质享乐主义,更不是消极玩世主义,而是饱含着一种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的济世情怀。梁启超之所以对自然、对人生有那么浓厚的趣味,归根结底在于他的“趣味”是超个人利害得失的爱国忧民之情。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梁启超有一句口头禅:“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作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目的,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忧民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身倡导着。”^[5](第 82 页)这种对待社会的积极入世的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不也是一种审美的态度吗?以这种态度对待社会,对待他人,一定有利于建立良性循环的社会新秩序和和谐的人际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文集第十三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41.
 [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文集第十四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41.
 [3] 聂振斌.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4]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文集第十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41.
 [5] 陈引弛. 自述与印象: 梁启超[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7.
 [6] 易新鼎. 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 叶娟丽)

LIANG Qi-chao's Interest Education: Theoretic Connotation & Historic Significance

HUANG Qin-ming¹, TU Wen-qian²

(1.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HUANG Qin-ming (1969-), female, Lecturer,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 aesthetic education; TU Wen-qian (1969-), female, Editor,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major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bstract: Starting at the logic concept that the interest is aesthetic perception, the theory of interest education developed by LIANG Qi-chao elaborated the import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human life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value of beauty appreciation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establish the united true, good and beautiful interest life as well as an ideal realm of life.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theory is rich and particularly creative. This theory has extensively explored the internal nature and the unique rul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promoted the birth of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hina. Although it has been about 100 years up to today, LIANG's theory about the concep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life ideal of absorbing the interest's nutrition and strengthening our health is still vividly vital and profoundly instructive.

Key words: LIANG Qi-chao; interest; interest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